

今日評論

第 三 卷 第 四 期

時 評

斥「汪日密約」(賈)

法幣發行總額(南)

關於小學教師(壽)

日本內閣的更迭與今後的政局

工業化的社會條件

對中國法學的希望

滇南游擊

王 迅 中
張 德 昌
朱 正
錢 能 欣
劉 秀 南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廿八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汪日密約

汪逆精衛與敵所簽訂的「密約」，近日已揭露於報端了。其中有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等文件。全國同胞披閱之後，對敵開侵華的陰謀，更得到進一步的認識。依據此「密約」的規定，我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都將在「經濟提携」「高麗結合」等一套名詞下完全斷送了；各國在華的權益和地位，將在所謂「日支合併」的體系下被摧殘了；中蘇間的友好關係，又將在「共同防共」的政策下斷絕了。在此「密約」上，明明規定用軍事體制，以控制我國；明明企圖藉侵略手段，以剝削我民；而敵人仍高喊着什麼「平等」，什麼「合作」；實則居心之險惡，已為世人所俱知。吞滅中國，獨霸東亞，原是敵國軍閥的一貫政策，自「近衛聲明」以至這次「汪日密約」，都是圖謀實現這個政策的證據。我們敢信除汪逆一派以外，凡稍有民族觀念的人，窺破了敵國的野心，那倒不切齒痛恨！

汪逆精衛自降附誘和以後，樹德未成，登台心切，乃不惜在敵國的指使之下，進行其賣賊求榮的勾當。這次「密約」顯然是在其建立傀儡政權前與敵國所訂立的一種協定。在此以前，國內仍有人不相信汪逆會甘心出賣祖國，現在當恍然大悟了；在此以前，國內仍有人希望敵國會幡然改變方針，現在當不再作此想了。由世以觀，汪逆陰謀的大暴露，對我們抗戰信念的加強，一定有推波助瀾之效了。

其實，汪逆既成了人民的公敵，國家的叛徒，其所簽訂的那些卑劣文件，自然不生任何效力，所以國人儘可視同一堆廢紙。敵國要求和平，祇得向我中央政府折衝。在今日，我國事與外交，俱由最高統帥主持着；此外無論何人，都不得隨意倡和議，擅自簽和約。執此原則，我們對叛國者的陰謀奸計，祇有一致加以痛斥，勿使絲毫搖動我國抗戰的信念。（頁）

法幣發行總額

本月十八日各報載，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檢查中交農四行發行額報告，截至二十八年十二月份止，四行發行了總額共達三十萬萬零八千餘萬元，現金與保證準備各為十五萬萬元。初一看，這個發行數字，覺得相當龐大。原來在抗戰之前，截至廿六年六月止，法幣發行總額僅為十四萬萬元，兩年半的時期中，法幣數目增出了一倍。自然尤其可注意的是發行增加的速度：廿七年六月法幣發行總額為十七萬二千萬元，由此可知戰爭的第一年我們法幣只增加了三萬萬，其餘的十三萬萬元則都是最近一年半發行的了。

紙幣發行的增加，原為戰時各國所常見的通常現象。除非發行毫無限制，我們無所用其疑慮。我們看看敵人紙幣的發行額，比我們的數目既大而增加速度更快。戰事發行之前，敵人發行總額只有十萬萬元，據最近哈瓦斯電的報告，日圓流通額已到三十八萬一千七百餘萬元，可知敵人通貨膨脹的危險比我們更大。何況我國法幣發行額的增加，除了戰費的原因外，尚有其他正當經濟理由，例如法幣推行的區域由各省到邊遠區域，自然要增加法幣的流通數目，我們再就法幣，現金準備來說，現仍合發行總額百分之五十五在內。這是一個頗高的準備率。假如有必要的话，現金準備率可以減低而不至動搖法幣的基礎。也許有人懷疑我們現金準備的真確性，以為我們那裏來此鉅大的數目。但我們信賴賢明的金融財政當局的健康政策，不必加以種種無謂的揣測。

不過法幣發行之大量增加及增加之速，確值得我們予以嚴重的注意。法幣的準備雖然充足，基礎雖然穩固，我們雖然尚有發行更多的力量，但我們不能不顧及到社會對法幣所承受的限制。超過這個限度，流弊可多了。為避免可能過度通貨膨脹的弊害，我們應加緊生產，鼓勵節約，利用遊資，使

民間儲蓄吸收一部分全債發行，尤其是對調平物價，安定人民心理，使貨幣流通不致加速，應為目前之舉。——（南）

關於小學教師

「抗戰不忘建設」，在粵北捷報聲中，蔣委員長一月十六日勸勉全國小學教師的通電，是很有意思的。——「教育為救國之本，而作育兒童之小學教育，又為救國教育之本」。這是人人共曉的道理。小學教師「待遇低微，生活艱苦，尤以抗戰以來，物價激漲，益趨於困難」，這是人人曉得的事實。事理本很明顯，可是抗戰以來，大家對於小學教育的重視，很不普遍，對於小學教師的待遇改進，更沒有甚麼努力。

日本內閣的更迭與今後的政局

王迅中

自七七事變以來，僅時值二載有半，而日本的內閣已經三度更易了。近衛閣下的職，自己無法收拾，藉口「必須成立新內閣，一新人心，以執行東亞新秩序」，而桃之夭夭，將這難題交給平沼。平沼為滿足多年來組閣的慾望起見，味然接受，但登台後躊躇猶疑，左右為難，內政外交一籌莫展；爐竈一時的法西斯巨魁竟被罵為「最不孚人望的內閣」，而藉口「複雜難奇之歐局」，黯然下台。元老重臣本擬推薦廣田或宇垣繼任，因軍部反對，未能實現。於是從垃圾堆裏檢起了一位好好先生——阿部信行——出來組閣，所以成立之初，輿論方面即譽為「垃圾」，「弱體」，「次等」內閣。的確，以阿部比近衛與平沼，無論就地位，資望或能力言，真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再就閣員人選言，也大部是投機的官僚與政客，所以有人稱之為「官僚閣內閣」。反之時局危機則日趨嚴重，與內閣的收拾能力，恰成反比例。所以阿部內閣的短命是衆所意料的。果然，僅八月三十日成立以來，僅四個月零十六天，就被迫退場了。

阿部內閣退場的原因，和近衛及平沼的辭職原因，可以說是大同小異。

現在最高領袖關心於小學教師了，發出這樣誠懇關切的通電，聲聞所及，雖是窮鄉陋巷，莫不興驚鼓舞。此後小學教師將為全國人士所重視，大概可以無疑，問題是改善待遇是否即能實踐？委員及通電中既說：「其應亟謀改善，政府責無旁貸」。日前教育部長顧先生發表談話，也說「教育部自當與各地方當局合作籌施有效辦法」，可見政府不僅有個表示，而有準備實行的誠意。實行的關鍵在經費，各有關係的機關是不是能「寬籌經費」？社會人士是不是一能「解囊相助」？我們認為不是不可能，可是要政府強力推動。政府已經認清責任，已經剴切表示，我們拭目看他而努力推動。（詩）

第一是由於內政外交的無法收拾，第二是由於總健與過激兩派的鬥爭，內閣左右為難，無法應付。先就第一點言，日本自對華作戰以來，死亡枕藉，耗費不貲，人民忍痛茹苦，已二年有半，戰事結束不但遙遙無期，內外危機且趨深刻，民怨沸騰，舉國惶惑。所以阿部就任伊始，即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安撫國人。歐戰爆發，日本朝野咸夢想利用列強無暇東顧，遂會對美東盟盟讓步，使中日戰事得以迅速解決。但數月以來，外交到處碰壁。對美法雖盡盡火打擊之能事，然除不關重要之技術問題外，毫無收穫。對美外交，野村雖一再乞憐緩訂商約，復謀以尊重美國權益及開放長江下游為感。但美國迄不為動，輿論方面更多主對日禁運，暴日徒蒙羞之石，而無補實際。對蘇外交雖已開始談判，但前途困難尚多，根本解決殊不可能。至於對華問題，西尾板垣之軍事進攻既遭慘敗，偽中央組織亦因外交，財政及軍事種種困難以及傀儡間的擠軋磨擦，遲遲不克成立，且以汪逆之聲名狼藉，亦決不足以號召中國人民。所以阿部尚願勸導導國人，謂「中日事變決不能因新中央政權之樹立而得解決，國民政府尚擁有二百數十師之軍隊及百餘萬之遊

南京圖書館藏

舉，解決中日事件至少須五年或十年。因此歐國人民至感失望。

內政方面，由於少數閣僚主義，貿易設置問題，物價對策，米穀等問題，阿部內閣莫不焦頭爛額，一籌莫展。阿部內閣成立之初，本應軍部要求，無妨少數閣僚主義，擴大總理大臣職權，以便集中權力。應付「事變」，所以只發表了八個閣員，餘均採取兼任辦法。但不久即發生摩擦，如以商工大臣任堂草雄兼農林大臣，深為農林省所不滿，對於伍堂標榜的低物價政策，而認係不利農村利益，攻擊備至，阿部終於不得不邀有馬系的酒井忠正專任。其他的兼任職也一律改為專任，內相小原直兼任的厚相改選秋田清担任。遞相大臣永井柳太郎兼任的鐵道大臣亦邀永井秀次郎担任。當初的少數閣僚主義完全拋棄了。這種反以無常的辦法使軍部不快，內閣威信也一敗塗地。貿易設置的原意在利用歐戰之機，整頓國內工業，振興對外貿易，已與內閣會議通過，但遭外務省強烈反對，通商局長以下百餘人聯名呈請辭職，駐外使領亦通電響應，阿部野村不得不收回成命，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伍堂所標榜的低物價政策不但未能奏效，反而促使物資缺乏，物價繼續高漲。最近的米荒問題更使歐戰焦頭爛額，搶米風潮不絕發生，國民生活益感不安。至於一般輿論所期望的革除官僚機構，實行統制經濟，以適應戰時需要的要求，當然更談不到了。阿部內閣的內政外交既皆著者失敗，被抑了很久，的政黨議員，乃投機攻擊，企圖恢復政黨的地位。但歐國內政外交危難的不能解除，根本原因是由於戰事的無法結束，而戰事無法結束責任則不在阿部內閣。阿部內閣不過是代人受過而已。

次就第二點言，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政治永遠在維持現狀與打破現狀的兩派明爭暗鬥之中，一面是奉天國寺元老的重臣集團及正統財閥等，一面是少壯軍人及法西斯份子，這種鬥爭隨着內外危機的加劇而日益尖銳化。近來軍部雖因整風漸趨，氣焰稍斂，但干政的野心始終未減，內閣被挾其間，左右為難。近衛負元老西園寺之厚望，因不堪軍部的壓迫而台；平沼亦因板垣之勢主實行總動員法及締結三國軍事同盟而場合；阿部的場合表

阿部內閣是重臣與軍部的折衷產物，成立之初，軍部本來推薦好幾位純法西人人物，提出了好幾個條件，但自阿部與湯淺及近衛會商後就變卦了，軍部當然不樂意，阿部一方面要遵循元老重臣的意見，一方面又要遷就軍部，結果左右為難，一籌莫展，成了政黨投機攻擊的目的，阿部雖企圖變機，多方活動，終因軍部要求辭職，不得不掛冠而去了。

候補呼聲最高的是近衛文磨，因為他是中日戰事的發動者及「東亞新秩序」的倡導者，所以大家希望他來收拾時局，但他有自知之明，寧願幕後操縱，拒絕再作馮婦，其次是宇垣一成，畑俊六及荒木貞夫等。宇垣雖為重臣財閥所推重，但為軍部所忌視。畑在軍人中雖思想較為穩健，但以現役陸相而任總理大臣，終將惹起國際觀感，且當阿部辭職時，軍部會表示對華事件軍部可負全責，干政之心溢於言表，所以元老重臣不願推薦，荒木在九一八事變時，氣餒萬丈，極為少壯軍人所崇敬，年來雖稍斂跡，有候補首相的呼聲，但元老重臣等既不放任，而軍部亦視為已非理想之傀儡人物，因此，首相冠冕又落到一位意外人物——米內——的頭上。米內係海軍大將，在元老重臣看來，或許較易聽命軍部，並且他在平沼內閣的海相任內，和陸相板垣辯論，極力反對與德義訂立三國軍事同盟。所以傳說米內內閣發表後，軍部大為不滿，擬便畑俊六拒任陸相以要挾，雖然未成事實，但軍部的不滿以及新閣前途的黯淡，不難推知了。

次就新閣的人選看來，米內在海軍雖然勳功卓著，歷任林，近衛及平沼三內閣的海軍大臣，但對整個國策，並無特殊的見解和魄力。觀彼就任的聲明，謂將以堅決之意志，推行「東亞新秩序」，處理中國事件，對華仍本既定政策，對歐美將以獨立主動地位，調整外交；內政方面，努力開發資源，穩定人民生活。完全是一套陳語濫調，前車可鑒，明知故犯，期以挽救危局，何異緣木求魚。閣員方面，也並無特殊人材。重要閣員陸海軍大臣仍由畑俊六及吉田善吾蟬聯。外相有田八郎雖係日本外交界中有名的中國通，曾任

內閣時，許華大使，外務大臣及字垣的外交顧問等要職。但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繼宇垣任外務大臣後，歷近衛平沼兩內閣，並無若何建樹，對於歐戰外交，更無打開之方策，平沼內閣因外交應付失策而塌台，有田正是首當其衝的外務大臣。目前日本外交的艱困，並不亞於近衛平沼時，有田有何能為？大藏大臣由民政黨顧問櫻內幸雄擔任，預算案在議會中或可減少若許阻礙，但如何解救經濟危機，殊為可疑。櫻內歷任各電氣會社社長，在實業界雖不無少許聲望，但比之池田，不無小巫大巫之感，池田尚慮其歸難為無米之炊，櫻內更無論矣。其他閣員如內相兒玉秀雄曾任岡田內閣之拓務大臣及林內閣時之通信大臣，現為貴族院研究系議員。文相為舊密顧問官松浦鎮次郎，歷任文部次官，朝鮮京城帝大及九州帝大等總長，對於學生過激思想之防止誘導，頗具手腕，因為軍部所賞識。法相木上村達屬墨野系統，係司法界之法西斯份子。農林大臣島田俊維代表政友會入閣，曾任廣田內閣農相。商工大臣藤原銀次郎係實業界巨子，為王子製紙會社經理，醉心德國之工業建設，主張投資國防事業，迎合軍部意志。鐵道大臣松野鶴平係政友會正統派主角。拓相小磯國昭係陸軍大將，一度頗為各方所期望，有候補總理之呼聲，但就任平沼內閣拓相後，亦平凡無所表現。遞相勝正憲係民政黨議員，原相吉田茂曾任岡田內閣的書記官長，是一位新官僚領袖，各閣員皆最複雜，缺乏強力的統一性，並且大都是官僚政客，並非一等的政治家及財界領袖，故歐戰輿論界也認為「新閣缺乏新血液，最優秀的政治家及財界領袖未曾加入，不足實現劇烈之政策，以消滅國內之不安，適應財政經濟之迫切要求」。比之阿部內閣，仍是半斤與八兩之別。至於今後日本的政局動向究將如何？先就外交言，米內首相與有田外相均聲明新閣之外交政策，將以處理中國事件為目標，並着重於調整日本與第三國間之關係。關於對華問題，米內仍念念不忘「東亞新秩序」，並謂決不既定政策邁進，故今後敵對華政策，決無改善可能。敵國當局雖然急於解決對華戰事，但對於所持對華政策及輿論內隱諷，並無澈底的覺悟。觀於暴日對汪逆所訂條件之苛刻，較五

九時之二十一條，更為惡毒，其無悔禍之意，至為明顯。米內既非眼光遠大的政治家，也決無這樣大的胆識和魄力，所以中日問題的合理解決，尙非其時。我們固然不能作此夢想，外國當局更應認清日本局勢，只有援助中國抗戰，才能使暴日就範。

至對歐美列強，米內是海軍人物，且曾駐在英美，對於歐美的情形，比之一般盲目的少壯軍人，認識較深，有田外相過去雖係簽訂三國反共協定的主持人，但對英美外交仍主力圖調整，在外交界中彼目為歐美追隨外交的人物，與白鳥領導的所謂革新外交派絕對不同。於就任後對日本記者表示：「對美執行前閣政策，先求兩國關係之正常化，建立日美的傳統友誼。仍以開放長江下游為餌，企圖續訂日美商約，解決其他懸案。對蘇則強辯反共協定與日蘇友好為截然二事，日本將努力解決兩國間一切懸案，而先從劃界問題着手。對英則謂「相信英國覺悟之結果，可使日英關係於不久期間內，得以改善」。對於德意則仍主維持防共協定之友好關係，認為與美蘇接近一事，並不衝突，簡言之，新閣的外交政策，大致與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無大差別，夢想利用歐戰之機，與歐美列強妥協，以便全力解決對華事件，而對美蘇外交尤為重視，不惜獻媚屈膝，以達欺騙目的，對集權國家，則仍維持友好關係，以留對美英法等民主國要挾之餘地，但列強會受暴日的欺騙嗎？阿部前車可鑒，殊無討論之必要，現應注意者，即新閣對於對歐美外交失敗後，究將如何應付軍部及法西斯份子的攻擊？

最後，就日本的內政言，穩健與急進兩派開磨鬥爭，民心的厭戰不安，姑且不提，備從經濟一項而言，敵國的危機差不多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負債已由前的一〇五億，增至二百四十億以上，紙幣發行額由戰前十億左右，增至三十八億餘，下年度普通預算已達一百〇三億之譜。櫻內有何能力，籌措如許巨款？公債和紙幣的發行，早已超過了飽和點。捐稅自七七事變以來，也已一再增加，竭澤而漁。通貨膨脹與苛徵暴斂的結果，物價暴漲，人民生活益感不安，伍壹的低物價政策已經完全失敗，新閣相繼原氏既

不研究物價高漲的原因，捨本就末，仍斤斤於物價的強迫統制，結果恐不但不能減低物價，反將促使黑市橫行，更增社會的不安。至於最近嚴重化的食米問題，新農相島田俊輔歸咎於供求的缺乏調節，其實本年因歉收及農村壯丁的缺乏，供給不足量，至少在一千萬石以上，這是鐵的事實，食米不足即使可用外米填補，但農村的危機如何補救，民生的不安如何消除，是根本問題。據說新閣將在國內設立永久性質的經濟委員會，專門研究商品及食米問題，這兩問題的嚴重性由此可知了。其他如對日團集團以外國家的巨額入超

工業化的社會條件

在抗戰之前，許多人討論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時候。常常舉出政治上不統一，交通不發達，幣制不統一等等，認為是中國工業化所以不能早有成效的原因。甚至有些人用保守主義來解釋中國社會對於新興工業的一切阻力。抗戰以來，情形大不同於戰前，無論政府，私人都在提倡建立工業。但是困難還是十分多。以前的困難中有些已不存了，而新困難又發生。交通問題和以前一樣嚴重，資本和技術的問題，技術工人的供給問題，都是關心工業建設的人所一再提及的，我們以為在各種新舊阻力之中，有一種根深抵固的力量是建立新式工業的一個大障礙。這個大的阻力，不是政治的，經濟的，而是社會的阻力。自然在一個社會裏，政府僱員之無近代吏治精神，政治機構之缺乏健全組織，可以給新式工業以大的打擊，舊的經濟利益多方面攔撓新經濟事業，可以使新事業不能立定基礎。不過如果我們以現有的情形來看，社會的阻力比之政治經濟的原因還要重要。

講到社會的阻力，我們很容易聯想到一般人的風水迷信的觀念。自清季以來，無論開礦，修路，常常因為地脈風水等關係，不但受到鄉民的反對，而且為政府所不允許。光緒中，熱河發現煤礦，有人上奏請開採，但因距皇陵太近不能就地設廠開採。初議修建塘沽鐵路的時候，有不少人舉出塘沽地

，資金的日趨枯竭，更增暴日經濟危機的嚴重性，這問題並非不是換一個內閣所能解救的。

我曾屢次說過日本的危機決不是「人」的問題，而在事實的本身，近衛平沼，阿部三內閣的施政方針，可以說是大同小異，而場台的原因，都是由於內政外交的無法收拾，就米內以及其他諸閣員的施政談話看來，與阿部內閣的政策並無異致。近衛，平沼，阿部都做了時代的犧牲者，米內又何能倖免？（一月廿一日）

張德昌

近京畿，有修運勢，請求從緩。這種阻力現在減少得多了。近來許多地方修路設廠並未常遇這阻力。實在許多人講中國鄉民迷信保守，都不過盤其詞。中國鄉民誠然保守者多，但是將保守組織成一種力量，公開表達出來和新興勢力對抗，對於鄉民還是不容易的事情，在過去所謂人民反對，常常是身當其衝，官吏或少數地方有力者藉人民來反對。我曾查出許多有好幾次反對築路的案子，與其事的官吏往往捏造人民反對的情形，來和政界對抗，等到詳查之後，纔知所謂人民反對全是官吏藉口。這種阻力不是真正社會的阻力，不是新興工業的真正障礙。

新興工業的真正障礙是中國社會裏另一種力量或精神。這一種精神我們可名之曰會館精神或行會的精神。所謂會館或行會的精神並非專指手工業者之精神。事實上有些生產組織仍在手工業時期，但主持的人是富有近代工業家的企圖精神的。同時有些新式工商業，雖然形式，仿照近代西洋的組織，但是主持者的精神仍是舊式的行會精神。我們此處所說的會館或行會精神是廣義的。在西洋，近代以前，有商人行會，工人行會，這在商人行會，影射行會，學徒行會等種種分別。在中國則行會的精神，不但見於商幫，工匠，學徒，而且見於士大夫，智識階級和官吏。我們有各種商業會館，還有同

總之。近年來，名稱雖有改變，本作的會館改成了木作業協會或同業工會，江蘇同業會改成了江蘇同學會或其某研究會，實質上並沒有變動。這種精神原為中國所特有，但是時至今日，這種東西在西洋社會裏已消滅了，我們仍依然如故。甚至從外國回來的人，也本這種精神來組合，英國同學會，留德同學會，德奧同學會，法比同學會，歐美同學會等都多多少少是這種精神的表現。這種行會的精神有兩個基點：其一為地方觀念。其二為細口觀念。行會精神及於社會其他方面的影響，於此非我們所能盡論。我們現在要說的是行會精神及於新興工業，經濟事業的影響。

會館或行會精神的第一個基點是地方觀念。說到地方觀念，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不承認，地方觀念有大小各種程度之別。有的人以一鄉一城為本位。有的對於地方區別看得重於一切。本城人和外城人，本省人與外省人，在有一部人心中區別得很清楚。這種地方有其經濟史的背景，在以前，現代國家還未出現的時候，同地域的職業業者，利害相同，結合起來，採取一致的行動，可以得到很大的保障。中古時倫敦的行會商人，以本城人自居，只是倫敦一外內商人，不問是約克來的，牛津來的，都被看做外國人。歐洲大陸，莫不如此。中國情形也如此。我看到清朝乾隆時期的寧波商人的會館章程，其對於本城與外來客商之分。在同一城市裏，本地與外來客商的權利義務兩不相同。本城之內，住民互相對待要誠實不欺，公平待遇，如果發現有人作弊，使本城其他人吃虧上當，受損失的人可以訴之於行會，由行政公所，法庭。但是對於「外國人」這些原則可以不適用，至今英國人本國都是「求公平（Fair Play）」，但對於外國人，或是在殖民地，往往將這個原則拋之一傍，還是有中古時的風味。地方觀念的結合，有其保障的功用，所以會被人看得重。一個比利時城市的商人到了倫敦，倫敦人不把他看成某甲某乙，或是某木匠某毛鐵匠，而視之為比利時人。他的一舉一動本不能代表全比利時人，但是他的言行舉止都被視作比利時人的特色。有一天他犯了罪，不該與他比利時犯罪了。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會感有人我之分，愈感有重

說本地與外國之必要。所以行會精神充斥的社會裏，只有地方單位團體，沒有單獨獨立的個人。個人要和地方合成一體。兩人相見，首問籍貫。如果知道了他是湖南人，仍就就把他看為具有全副湖南特色的代表：愛吃辣子易發脾氣，矯捷，勇武，富革命性等等。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人的名片上除了註明他的姓名之外，職業可以不寫，但籍貫一定明列。——高爾礎，浙江紹興。行會精神在過去有其用途，但是今日，是應該摧殘根拔的一種社會力量。在政治統一的基礎上，我們來建立新式經濟事業，我們第二步先要消除這種基於城鄉本位的行會精神。我們應當把小的地方觀變為大的地方觀，把小的公平推廣而為大的公平。使國家成為唯一的單位。在這個國家立場上，對於其他國家分別遠近，分別待遇。在外國領土，中國商人，工人不能平等的和外國人競爭。我們的商人工人有時要吃虧。在中國我們雖不當被視外人，但是在可能範圍內外國工商業不能享有更大的特權和便利。只有在國家單位的基礎上，新式經濟事業方可以立足。一個企業家要創辦一種工業，他的算盤是有全國的算盤，或更大於全國範圍的算盤。他的工廠的出品不祇是一地一鄉，需要，而是在供求更大的市場。不能用城圍地界來限制他的資本和技術工人的流動，也不能限制他的出品的市場。但要促進工業的發展，祇靠政府的法令和規律還不够，必需整個社會予以同情的協助才行。我們有時聽到說在幾個地方都有一種現象，就是一些企業家在某地創辦一種工業，在購地設廠時，有時受到不甚公平的歧視，或是地租特別提高，或是不能予以方便，使許多人知難而退。這其中固然有一些是投機作用，但地方觀念也恐怕不免。這種社會的力量是創辦新式工業的一大阻礙。要消除這種社會的阻力，惟有政府的法令，還不易奏效。最有效的辦法是教育和交通。我們希望辦理新聞事業的人能聯到這點，在消極方面當避免引起地方觀念的文字，消滅這種會館的精神。同時在積極方面多多提倡國家單位的精神。要回這方面做，單在社論或著說立論並不够用，因為有許多人看報紙，看報的是新聞，不

精神來撰述，其影響是很大的。許多人以為地方觀念是交通不便的副產物，所以認為這是不十分重要的問題，一日交通發展了，自然而然與人的關係會起一番改變。這種看法有相當理由，但是我們不能坐待交通發達之後，再求國家、地方的精神代替地方觀念。我們應當就目前能做到的即刻着手來做。

會館實行會館精神的第二個基點是糊口觀念。從事工商業的人立志不大，眼光甚短，也可以說沒有野心。他每日工作只求「够吃的」，不是與時逐利，及更多更大的財富。中國有許多舖戶，製成品在顧客方面有很好的信用，但是他們不求擴大規模，來吸收更多的主顧。自己把出產的產量固定了，賣完完事，不求多掙錢，主要的原由即是多糊口觀念的支配。因為合計下來，一天所得已足够花費之用，便覺滿足，不必更求多得。中國有許多商店在仿單上常註明「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這固然是防假冒的用意，一方面也是糊口觀念的表現。如果出品得無信用，可以去各地擴充，為什麼要只此一家呢？初到內地的人都有一種經驗：到商店裏買東西，常被店夥冷視或甚至惡言相待。非但不能拿這種現象歸咎於某地某店某個人，而當認清這些是糊口主義者。他沒有多謀利的思想，儘管有許多顧客被得罪了，但是一天之內總有幾個顧客，幾位顧客的購買已可使店夥一日的食用。又何必屈意奉承以多

對中國法學的希望

我們中國法學，在世界法學的場面上，也曾出過風頭；不過因為一般聰明才智之士，都把畢生精力，消耗在文藝上頭，而對於法學，不是加以輕視，便是漠不關心；並且以「禮讓」出色的儒家，更起而拚命的反對法治。法學之士又不肯努力求進。因此，我國法學便墜入萎靡不振的狀態。

中國法學過去的處世態度，在現今這個世界裏，我認爲「祇有招架之力，絕無回刀之功」，決不會造出怎樣了不得成績出來。現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氣，和從前只是人不爭氣，在「和平絕望」的時候，我們交勇地互

求呢。舊日觀念的社會裏，無法發達工商業。市場的廣度，顧客的嗜好，將來的可能發展，全不在考慮之中。糊口觀念和近代工商業家的精神相反。這種觀念的存在不但不能促進原有經濟事業的發展，而且對於具有企業精神的工商業者是一種阻力。他們懷疑，嫉視新式工商業，不全是因為利害衝突，而是在精神上不能併容。在西洋中古社會裏，有許多懷有企業家精神的工商業者，如意大利人，南德人，猶太人，常遭毀謗被逐之禍，攻擊他們的人，並不說由於利害關係，而常用社會的罪名爲虐待他們的口實。這是糊口觀念主義者的反抗精神的表現。

地方觀念和糊口觀念是會館精神的兩個基點。會館精神在根本上反於新興經濟事業的精神。過去迷信風水的觀念可以將吳淞試修的第一條鐵路拆毀，投之於江，會館的精神使工業化的程度減緩，兩者同爲新興經濟事業之有力的社會障礙。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裏，在開始經濟建設的時候，我們首先當注意於這種基本的社會阻力。抗戰以來，兩年多的時間，舉凡各種事業都待發展。但是直到今天，屈指可數的幾個有規模的工商事業，仍是開辦事業，私人企業寥寥無幾，此其故安在？這是由於我們社會仍未脫除會館的精神。欲求中國工業化之早日奏功，當自清除社會阻力的條件做起。

正

不挽地，抵抗強暴的侵略，深知道祇有爲我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據理力爭，纔能得到和平。「中國法學」的處世態度，我認爲也有改取「奮鬥」二字之必要。「中國法學」能以「奮鬥」爲今後處世的態度，才可以創造一種獨立的法學。這祇是建設中國法學，而不是復興中國法學。我始終認爲非根本改變中國法學處世的態度，而僅僅復活中國法學從前那樣的處世態度，是絕對不能生存的資格。

我國法律思想，起初是儒、道、墨三家兼營之業。唐虞時代，制定五

刑，實爲中國法學之權輿。當時洪荒初開，故其時法律思想，亦泰半含有神權思想的意味；墨子雖非法家，然其法學思想，則注重尊天，殆不脫神權觀念。至孔子之論政，則根本主張人治；而其論治，則主張禮治。此後，曾子孟子，繼承其系統，不過，孟子目光較遠，故又注意到社會上去，他以為，人不爭而罹於犯罪，皆由於經濟的壓迫所致，故須從根本上施以救濟，以減少犯罪，此實爲刑事政策之必要，而亦合乎民生主義之精神。二千年前，已見及此，不可不謂獨具隻眼。道家之老子，則大倡其「自然法說」，這時侯，中國法學，已開其端倪矣。周秦之際，諸子爭鳴，法家之管仲，則一馬當先，仗其一身大本領，奠定了中國法學之基礎。接着子產范蠡，均能苦幹實幹，增加了中國法學不少的氣力。到了戰國，李悝的奇書（法經）問世，替法學增色不少。此後申不害商鞅，流皆以法治主張卓著而成名。迄乎戰國末年，則慎到尹文，更能刻苦用功，精研法學，至韓非而舉其大成，中國法學至是確已聲勢浩大。但至漢而遇尊孔，儒家中興，宣傳得法，聲勢頗大，法家大受挫折。迄乎唐，中國法學，就現露衰退氣象。初唐時候，雖有唐律一部奇書，使中國法學稍見起色；但唐律以後，法學之進步，就此停頓，而漸墮於萎靡不振的狀態。唐尙如是，後代便可想而知了。以迄明清，而至民國，法學一向不被人注意，而法學之士，則亦被人輕視。

中國法學有數千年之歷史，本可奮發而有爲，徒以處世態度不佳，以致遲滯不前。從今日起，如能改變處世態度，前途仍是不可限量。二十世紀是一個破壞時代，一切思潮，均在動盪，醞釀和懷疑中。在這個時代裏，顯著的表现，就是中心思想的缺乏，對於一切，無所信賴。中國法學要在這個八卦陣式的動盪裏，殺出一條血路，重整旗鼓，創建一個獨立系統，確是一件難乎其難的大業。

雅片戰爭的砲聲，使我們中國從「閉關自守」的狀態，一轉變而爲「門戶開放」的境界了。歐美文化，以擁有雄厚之武力，與新式生產工具，衝破了中國固有法制組織之社會，因之，古老的中國大起變化了。從前我們中國

的法律，是以天朝上國自居，和歐美的法律，不相接觸。但是從海禁大開後，歐美法律思潮輸入，事實上，中國法學態度已大變了，不問外來法律之性質爲何如，中國社會和人民之需要復何如，徒知抄襲歐美日本等國之成文法。法學不過是思想的一個支流，當然免不了受那風行的人生觀和科學思想的影響。思想是不經而走的，又是無孔不入的，法學從十九世紀末葉到現在，不知經過了多少的變化和進展。這時期中法學思想，一方面反映着民族主義思想的膨脹，他方面又表徵着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自時代思潮衝入中國後，中國新開的法學園地裏，似乎呈現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吳德生先生以樂觀的筆調，來描寫中國法學界的現狀。他說：「那料到了今日一般人士，非但不輕法學，並且對於一切法律問題，覺得大有興味，茶餘酒後，時常以法律案件，來做談助，輿論界對於法律，更有一種很好的緣分；各地的小報，差不多沒有一天不載有訟案的特寫和批評。海上的大報，也多闢有法制專欄，或曰「法理」或曰「法言」；書坊中之識時務者，對於發行法學的書籍，無不鉤心鬥角，互相競爭，在這個適宜的並且鼓舞的環境裏，我國法學，再不能發達，尙待何時。法學的過去，屢於西洋，法律的將來，或許屬於中華」。吳先生這一段話，字裏行間，似認中國法學是傑出非常。但是吳先生所說的一番話，與我所得的印象，恰恰相反。我以為中國法學界是「暗淡無光」，吳先生所說中國法學界熱鬧的場面，我也承認並且也是事實，但可惜得很，這個熱鬧場面，是「交易市場」，不是「法壇」，各地小報的不斷登載訟案而加以特寫和批評，上海各大報特闢法制專欄，書坊之競爭發行法學書籍，有一藝之長的法學家之賣文，無一不是一種「交易現象」。

依我所知道，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中國法學界，也曾參加世界法學「運動會」；不幸得很，就發現不少人半途改逃了。他們脫逃的理由，當然很多，不是說「興趣不興」，便是說「政務繁瑣」。這輩半途改逃的人們，有不少是「材堪造就」的，假使繼續幹下去，則中國法學界，真可以較生色。

就現在留在法學界的人士而論，固然有不少是努力苦幹，有不少是聰明而好學，但也有不少的人，只想「他就」，也許他們以為中法法學界不夠熱鬧，不須得出去換換空氣，因此，不肯怎樣的努力。最使我們傷心的，是國人的仍抱着「輕法學賤法吏」的態度，他們以為法律學是最無聊，「法吏」是最無用。他們的這種態度，固然是觀察和論斷的錯誤，但研究法律者的不自己努力，也要負部分的責任。現在橫在我們的眼前，是法律著作的貧乏。除了幾本法學的翻譯本和幾部釋義書之外，簡直找不到一本比較像樣的著作。有數千多年歷史的「中國法學」，照理應該高人一等，勝人一等。但是現在的事實，恰恰相反。

到現在為止，中國法學尚未決定那一條路走，不要說「法學歐化」，便是說「六位法學」。我不相信，在這個動盪，擾攘懷疑而缺乏中心思想的二十世紀，僅僅仿效個人或保守祖宗的遺產，就够資格，就可以應付。所以為中國法學的前途打算，大家應該共同努力，打出一條血路。

以上所說，都是洩氣的話，或許有人會認是「滅自己的威風」，跟着就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中國法學難道沒有出人頭地的地方嗎？我對於這個問題，要下肯定的答覆。誰都知道，與我中華法系同時發生的，並有印度法系，回回法系。可是現呢？印度法系，回回法系，合併的合併，混一的混一，再也不能復見其一廬山真面目一矣。而我中華法系，雖氣勢不大，喪失法律的殖民地，終還存在到今。此山緣故，當不難想見中國法學，自有其精神和特色，法律思想和法制史，自身是一種法律和道德聯合之歷史。中國法學就在法律和道德聯合的過程中發榮滋長的。中國法學和道德，是處於同一範疇之下，道德是法律之內容，隨民生而變時，法律思想，亦隨道德思想而變。我國地處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之平原，地廣人稀，人民一向度其和平生活，絕少戰爭。且是時「政教」一倫理一合而為一，形成特有之法制。家族組織，以倫常為主，與希臘羅馬之重權利義務者不同。法律之待遇，絕對平等。對於外人，採感化主義，又與希臘羅馬之採征服主義者不同。且因家族組

織之鞏固，倫理觀念之確立，故人與人之間，不講功利主義而尚公義，且我國又以農立國，足以自給，交易較少，私法之不發達，殆由於此。此外於法之訴訟，重調解與公判而輕法審。

羅馬法系隨着征服而發展；英美法系隨着拓殖而擴充。二者的發展，和別無幾，惟後者歷史較短而已，其出於武力之後盾則一。而我中華法系則藉文化而發展，一向以「和平」處世。我們處在競爭的二十世紀中，其處世態度固欠適當；但從另一方面觀來，中國法學之「和平」態度，正是其精神或特色。

在現在，大陸英美法系，可謂譽之溢著。以言大陸法系，則德意志係集羅馬法之大成，然德意志一方保存其日耳曼民族固有典章制度與夫習俗風尚之特質，而一方則採取羅馬法之精英，融冶一爐，遂蔚為今日燦爛之日耳曼法系。英美法系歷史雖短，但廣而亦廣，其特色為公法，與大陸法系之私法恰成一對照。我國法學雖不應盲目做襲英美法或大陸法；但對於英美法與大陸法之法理及史的發展，須下一番研究工夫。

法律須以適合人民之需要為前提，尤須根據國情，參酌世界大勢。要想創建這樣的法學，除對英美法系大陸法系應加比較的研究外，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法制，民風習俗，以及宗教文化等，更須作澈底的探討。外國法律，無論怎樣好，如何完備，未必適合國情。我國過去立法，視法律為裝飾品，但知模仿，抄襲；結果，致行而不通。此弊歷久不改，良堪嘆！法律是一種估量和權衡利害的學術，負有探討人類社會的秘密與發展規則的任務。法學啓示了我們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從異中求大同，從散中求得整，使不致於茫無頭緒，陷於凌亂，純以客觀的物，去準取事變，以求理之所在。在個人與社會環境兩者兼顧的條件下，法學又能實地求得最適當的問題解決辦法，而增長調劑，對於社會環境的適應力。法律是一部專門的「問題解決法」，而增長調劑，對於社會環境的適應力。法律是一部專門的「問題解決法」，而增長調劑，對於社會環境的適應力。法律是一部專門的「問題解決法」，而增長調劑，對於社會環境的適應力。當然和自然科學的方法不同了。法律是一種應付社會生活的科學，而社會生

新的開端，是無時不在變化和擴張中。所以依自然科學的方法，或其他方法，而研究法律，那恐怕是機械化的法理學；反之，着重法律在對於社會實際生活之貢獻，那就是人專化的法理學。我們所應效法於中外大法家的，是他們所學立證的方法，決不是他們的具體結論。我們要創建一個獨立的中國法學，應着重法律對於社會實際生活的貢獻，建設研究法律的方法，這是建設中國法學最重大任務之一。

其次，法律不過是一種工具，一方面充實人生的價值，一方面又隨時隨地提高人生的意義。——這樣一個認識之下，我們要一方面研討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究竟在那裏，而他方面又要研究怎樣才可以使法律能儘量地促進和充實人生的價值，並提高人生的意義。柯拉氏認法律不過是人類精神生活當中的一個小支流。這精神生活，是很豐富而有意味的，並且不斷地在那裏發展着。有精神生活而後有文化，有文化而後方有法律，故法律不能離開文化而獨存。文化的目的，也就是法律的目的。法律既以文化之目的為目的，而又為文化之一部份，不消說，也應該以文化的理想為理想。雖然法律的力量有限，但也應該在可能範圍之內，儘量地促進文化，儘量地消滅和減少一切文化上的阻礙。由此而觀，建設法律之目的，也是建設中國法學過程中之另一重大任務。

當然，欲完成以上重大任務，我們對於法律教育，也應極力改進。過去

漠南戰爭

(一) 南口退守以後

二十六年十月敵軍攻南口不下，於是繞道多倫沿滬綏平鐵路，李服膺不加抵抗，湯將軍不得已忍痛放棄天險的南口。敵軍從張家口一直進攻大同，由大同北攻得勝口而入殺虎口。那時傅將軍的軍隊奉閻長官命令已全部調解，由西保衛太原，所以綏遠省境內的兵力實在稀薄得可憐。平地泉本來有蕭堅

中國法律教育的任務，是在教人怎樣解釋法律的條文，所以過去的方法是演繹的。但是我們要知道，解釋法律，固是一件必須的工作，但不是創造的工作；況且這件工作，外國已做得完滿，而我們還在拼命做去，並且還弄不出什麼好結果來。這我認爲是法律教育的失敗，此後爲建設中國法學打算，法律教育應有改弦易轍的必要。解釋工作以外，我們應注重哲理的研究，法律師以外，應栽培專家學者。(在理論上講，法官律師也應該於法學，但近年來中國法官律師並不是法學家，這或許是過去法律教育祇注重解釋工作所致)。在學校裏法律教育，於刑法，民法，商法，憲法，國際法，行政法等基本學科之外，更須注意社會科學基本知識，如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人種學，心理學，哲學，倫理學，美學等科，此外對於國學及歷史，我認爲也須有相當的根基。

最後，新法典的編纂，亦是我國法學界的一種任務。現行法典之欠善，這是公認的事實。不過，法典頒行已久，一旦廢而不用，事實上也有其困難。中國當今的法學，也沒有發達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要制定一部良善的法典，恐怕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祇有就現行法，逐條加以分析和研究，在適應社會環境的目標之下，漸次加以修正。

以上所言，一半是事實，一半是願望。這裏特加一番論述，與國內法律界人士商榷。

嚴能放
劉秀雨

烈的防禦工事，因爲沒有大軍駐守給敵軍順利地通過了。國民黨兩團作了壯烈的犧牲，這是綏遠人民第一次抗敵的悲壯的戰役，在中國民族的奮鬥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光榮。

敵軍進入綏遠後即分兩路，一路由綏遠攻平地泉，一路則由公路經涼城而襲歸綏，平地泉陷落後，敵軍大進西進，十月十四日歸綏陷落。綏遠家藏

會保安隊一千多人馬占山將軍的一部分軍隊全被包圍了。包圍的人民起了極大恐慌，並不是怕軍隊，乃是意料不到敵軍進展得如此迅速，平地裏很快的失守了，因此他們對於傳將軍的軍隊全被調往山內的消息，直到歸隊降落才知道，事前沒有準備，而敵軍由鐵道進攻包圍，又是非常方便的。

包圍的空氣異常緊張。組織民衆自衛軍，由地政局局長張欽，省黨部委員陳國英，高等法院院長于存瀾，包頭日報社社長李象五，統計處處長班浩，省立中山學院院長白健潭及現任參政員潘秀仁等七人負責以各縣保安隊爲基幹分頭組織。不幸自衛軍尚未組織，敵軍已至包頭。在包頭已成立的一部分和蒙政會保安隊等渡黃河南退，而在各縣已成立的如薩拉齊，武周等地的自衛軍則退入大青山，爲日後大青山自衛軍的基幹。

(二) 敵人的政治攻勢

敵人佔據歸綏以後，便實行分化盟軍的毒計，引誘烏爾察布盟和克爾圖盟組織親蒙自治聯盟政府。烏盟的圖子王族潘王意志不堅率領茂明安部，喀爾喀右翼烏拉特中旗等三旗首先投到敵人的懷裏，唯有烏拉特前旗額爾齊格俊峯和烏拉特後旗額爾齊格巴雲英（額爾齊格王公夫人之意）不甘降敵，親自帶兵，抵抗敵軍，這兩位女王爺後來率領家軍都到了固陽安北一帶的河套流域，繼續作戰，巴雲英女王爺的貝子（即王子）叫賈格色楞，蒙族的親例，女子是不能繼承王位的，所以巴雲英女王爺還是用賈貝子的名義帶兵，賈格色楞現在祇有七歲，時常在母親的馬上，中央封他爲烏拉特後旗保安司令。奇俊峯女王爺的貝子年更幼，中央令奇俊峯置理札薩克，這便是攝政的意思，自此不再稱額爾齊格了。

伊克昭盟有七旗，達拉特旗康王和準噶爾旗東西協理奇文美奇鳳鳴三人一時逃歸，豐言代表伊盟，出處自治聯盟政府。其他五旗：鄂托克旗，鄂王旗，杭錦旗，烏審旗及札薩克旗，得到了這個消息非常彷徨，不知應該跟着康王投降敵軍，抑是歸順中央抵抗敵軍，抑是不偏任何一方，嚴守中立。這至馬將軍平服達拉特旗後，才有了主意，一致擁護中央。據說當時各旗的蒙

民和喇嘛聽了這道旨日其合其某大召，駭子裏安置一屋一牛一驢，馬代表中央，牛代表蒙旗，騾代表敵軍，要一個青年蒙了跟射擊，如射中馬從中央，射中騾附敵人，射中牛則守中立。結果一箭擊中了牛。這雖是一個傳說，但實際上仍影響也很大。

蒙政會保安隊和包頭的自衛軍渡河以後，各自南撤。保安隊有一千多人，在綏東抗戰以前，他們原爲德王的保安隊，隊長雲繼光朱實夫不滿德王的作用，因此率部從察哈爾投降傅將軍，傅將軍收容以後加以擴充，方改名爲綏遠蒙政會保安隊；雲繼光死後，由白海風統率。這部隊後來中央改編爲蒙旗獨立旅，現爲新編第三師。當他們取道達拉特旗的時候，一點也不知道達拉特旗的王府裏已掛了太陽旗。他們從東勝的東部經過，在展旦召地方忽然遭遇到康王部隊的襲擊。康王知道保安隊經過他的地方，預先在召裏及附近一帶埋伏好了，待他們一到，一齊衝出，攻之不備，可以全部殲滅。展旦召一邊是高峻的沙丘，沿着召行是一條狹窄的小道。保安隊雖然人多，但在這個不利的情況下，實在是無可奈何。幸虧他們帶着四個小鋼砲，且戰且走的逃脫了危險。

馬占山將軍退出包頭後，是向西走的，在五原臨河駐了不多時，便率部渡河，至伊盟杭錦旗歸綏康王附敵的消息，於是他火速地向東進軍討討達拉特旗。康王那裏是馬將軍的敵手，求援又不及，王府被圍，康王被擒，青天白日旗又在王府的高杆上飄揚了。準噶爾旗也不敢動作了，一致向馬將軍投誠。自此以後整個伊盟在中央的指揮之下，這對於蒙旗的抗戰關係至大。因爲伊克昭盟東南是高山，西部是沙漠，敵人要想從綏遠進攻蒙旗和晉北，關州以截斷西北的國際路線，非得先克服伊盟的高山和沙漠不可，而高山與沙漠對於他們的機械化部隊是一個致命傷。

(三) 綏西——河套

和馬將軍同時退出包頭的有中央騎兵第七師長門炳岳將軍所率領的部隊。他們也在河套安駐，下來，但不久馬將軍率部渡河了，而門炳岳將軍還是

留在河套中綏西大局。所謂河套是指包頭以西黃河北岸的一個區域而言，包括五原臨河，和安北三縣，人口約二十萬，雨澤稀少，水田的灌溉，多靠灌溉。土地常肥沃，一經灌溉，便可種植，農產品以米麥為主，其產平時可供給包頭。但包頭土地不大，民團以來政府對於這一帶的水利，很費心血。唯一下農事所藉的還是王同春先生開創的八大幹渠，王先生對於河套水利的勞績很大，不過他的開發是沿用舊法，且多年失修，這八大幹渠，已淤塞幾乎不能引用了，河套的水利是綏遠的一個大問題，在新綏遠的建設中希望有一個完滿的解決辦法。

綏西除了河套的農業，畜牧業也非常發達，羊皮羊毛每年總是大宗輸往天津。羊皮中羊皮及仔羊皮為最優，包頭失守以後，運往天津的商路斷了，但有少數奸商私下販賣與敵人，而門自己的在冰天雪地中奮鬥的戰士，反而一件皮衣也沒有。這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門炳岳對綏西，綏西正在無政府狀態中，門將軍見各縣各自為政，決非良策，於是發動組織了綏西政務委員會，領導各縣，團結一氣，組織西防務力量，一而組織動員委員會，發動民衆，武裝起來。這時駐固陽的偽蒙自治軍於志謙部下一隊人馬趕來投誠，在門將軍指導下的綏西游擊第一支隊，合作抗戰，第一支隊司令武俊峯，他是安北的大地主，因此在第一支隊中農民佔了大半，此外知識青年曲步霄，和趙煥昌自動的組織了薩拉齊和包頭的民衆在綏西游擊，門將軍把他們編為游擊第二支隊。這兩個支隊和其他的游擊組織很早和火青山的游擊隊取得了聯絡時常襲擊包頭，固陽和安北的敵人，以牽制其西進，有一次曾經收復安北。

女王爺奇俊峯和巴雲英到了河套，在安北固陽間安定了下來，安北固陽間是片草原，但他們有高大的駿馬，原來都是沙漠中的英雄，三五十成羣，不怕敵人的大砲機關槍。烏拉山是河套東部的屏障，西山嶺形勢險要，可以控制大敵。游擊第五支隊史欽房（原爲額巴雲英的部隊。）近來在那一帶非常活動，十一月初的消息：一安北高台梁一帶廿七日復大雪，氣候嚴寒，已成冰天雪地，傳放連日向包頭安北陸續增兵，敵因我游擊部隊，近甚活躍，恐慌異常，加緊戒備。」

（四）伊盟昭盟

占山將軍平定達拉特旗以後，聯絡伊盟各旗，以札薩克旗爲中心，增伊盟的防務，札薩克旗沙王是伊盟的盟長，也是以前的蒙政委員會的

員長，自從游擊佔領綏後，副委員長潘王受敵人利用，因伊盟和盟一時不能合作，蒙政會也就此停頓工作，現在伊盟在馬將軍的幫助下，而且沙王又是蒙政會所歸的盟長，因此蒙政會在伊盟中又漸漸的活躍起來了。

敵人見達拉特旗的初步計劃失敗，康王隨馬將軍走了，以致政治手臉對付伊盟的策略，非但一無所獲，而且相反地增強了伊盟的抵抗的實力。游擊的參謀部以爲不得已中祇有趁伊盟尚未鞏固的時候，派兵佔領。十一月（二十六年）中，一聯隊精銳的士兵，奉了：「圍攻伊盟，掃蕩馬部」的命令渡過黃河。

整個伊盟是鄂爾多斯台地，沙漠兩野行軍困難。敵軍藉其精良的器械，首先佔領了統帥旗，強迫阿歸順，出而籠絡各旗，排斥馬軍。阿王其伊盟的副盟長，也是以前的蒙政會的副委員長之一。後來和沙王回到伊盟，極力整頓盟旗，恢復蒙政的工作，他自然不願受敵利用，雖然王府已給敵人佔據了，自己的生命在敵人的手中，可是他堅決地拒絕與敵合作，敵軍知要挾不成，按兵不動，也非良策，只得繼續西進，不久又攻下了鄂托克旗。這時陝西鄂爾多斯和高慶成兩將軍的軍隊已趕到，和馬將軍聯合在一起圍攻敵軍，敵軍不得已退出鄂托克旗，回到杭錦旗時，知與包頭的交通已爲游擊隊截斷，接濟無着，十分恐慌。馬部高的大軍逼近杭錦旗，敵軍狼狽地帶了阿王逃走，中途好幾次被游擊隊襲擊，渡過黃河時，人馬已不到一半了。

敵人的軍事又告失敗，帶走了氣節高昂的阿王，毫無利益。他們得到了一個教訓：「非但伊盟是不能輕易行動的，整個綏遠，甚至整個漢南，到處是荆棘，到處是『身中』的坟墓」。

伊盟合力驅逐了敵軍，內部團結的力量更加堅強了。以前從包頭退出的蒙政會保安隊（即蒙旗獨立旅一千餘名，在山西榆林駐了兩個多月，中央把它改名爲新編第三師，現在也調回伊盟了。）（未完待續）

本期撰者

王迅中與張德昌二先生在本刊常有文章，茲不必介紹。

朱正先生是西南聯大法律系學生，承其寄來長文一篇，本刊因爲篇幅限制，略經刪改後，特爲刊載，足以代表近來我國學習法律者的新覺悟和新希望。

本刊啓事一

本刊因近來紙價飛漲，自第三卷起，改訂價目如下；零售每期一角，訂閱全年四元，半年二元。

本刊啓事二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近已裝訂完妥，每本定價二圓，外埠郵費另加五角，各大書局均有經售，第二卷即將發訂，歡迎預約。

中國銀行

◎竭誠爲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

本行爲國民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資本四千萬元全國各地有分支行國外紐約倫敦星加坡巴達維亞仰光河內海防大坂等分行其他各國有代理處經理國內外匯兌各種存款放款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手續簡捷服務週到如蒙光顧母任歡迎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鳳翥街二號

總經理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零售壹角訂閱全年四元半年二元

中國實業銀行

本銀行成立於民國八年以輔助金融發展實業為宗旨
 國內各大商埠及繁盛區域均設有分支行及辦事處
 本總額四百萬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匯兌及一切銀行
 業務兼營儲蓄及信託會計獨立各種儲蓄及信託存款
 訂有詳章手續簡便

交通銀行

行銀業實國全展參為許特府政民國

務業行銀 切一營經

兌匯通均 埠商大各

元萬千二幣國本資

元萬十九百六幣國金積公

元萬千五萬五幣國額總產資

號掛報電 話 電 址 地 行分明昆
 四七〇〇 行銀通交 路碧金

聚興誠銀行

重慶總行 商業場
 昆明行址 金碧路
 全國各大商埠均設分支行

各種匯款
 各種存款
 商業部 抵押放款
 儲蓄部 活期儲蓄
 定期儲蓄
 整儲支息
 存取兩便
 信託部 代客買賣貨物
 代辦海關轉運
 代理各種保險
 代理太古聯運
 單押匯

金城銀行

為教育文化界服務

最誠摯的·是

上海總行 江西路

昆明行址 金碧路



寄航空信！

迅速 詳盡 省費

空中旅行！

快捷 適舒 安全

重慶 香港 河內 成都 漢中 西安

桂林 蘭州 寧夏 西寧 涼州

均可通航

歐亞航空公司

總公司 尙義街三號